

不可归零的承重：审计理性对“底噪”的清洗与一种不可被格式化的留白

针对当代效率逻辑对舍己承重行为的制度性排挤，既有批评要么将其诊断为道德衰退，要么试图为之寻求效率之外的伦理辩护或功能论证。本文的核心判断是：排挤之所以发生，不在于效率与伦理之间存在直接的价值冲突，而在于审计理性秩序在特定历史节点上将“可报告性”确立为存在的唯一判准。这一秩序的核心操作，是不断移动信号滤过比，将那些其承重功能无法在横向反馈回路中被确认与归零的存在方式，系统性地推向不可报告的区域。

作者 葡萄 · 约 2.3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针对当代效率逻辑对舍己承重行为的制度性排挤，既有批评要么将其诊断为道德衰退，要么试图为之寻求效率之外的伦理辩护或功能论证。本文的核心判断是：排挤之所以发生，不在于效率与伦理之间存在直接的价值冲突，而在于审计理性秩序在特定历史节点上将“可报告性”确立为存在的唯一判准。这一秩序的核心操作，是不断移动信号滤过比，将那些其承重功能无法在横向反馈回路中被确认与归零的存在方式，系统性地推向不可报告的区域。本文以不可归零的承重作为识别特征，将这一类存在方式重新命名为不可化约的底噪。它不是“没有功能”，而是“其功能无法被纳入一个可闭合的反馈循环”——它持续地给出，却无法从接受者那里回收一个足以在制度语法中被登记为“生效”的确认信号。由此，“底噪”不再被界定为一个“非主体际”的空集，而是被精确地标定为一类主体际的结构性断裂：有接受者，有给出，但给出与确认之间不存在可报告的闭环。舍己承重结构在当代的流失，从而不是道德衰退，也不是功能失认，而是底噪作为一个承重类别被整体逐出了建造的视野。论文先通过不可还原校验将“底噪”与礼物逻辑、隐性劳动传统等邻近概念严格区分（第一、二部分），继而以英国NHS社区护理审计改革（2000–2004）为锚点，分析审计理性秩序从“优化”蜕变为“清洗”的那个具体的发生时刻（第三部分），随后在残迹（空间底噪）、溃散时间（时间底噪）与不可核算的陪伴（核算底噪）三个现场中展示滤除机制的运行，并在每个现场完成“从边缘向核心”的推回动作（第四部分）。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可观察的外部判据重新界定垂直向度：不再是建造者与某个超越秩序的关系，而是建造者与非对称承重对象——即底噪——之间不可断绝的连接（第五部分）。继而，在与阿甘本“不作为”概念的短对质中划清边界，提出在时间、空间与资源三维为底噪留出不可被格式化的结构空白，并论证它为何不能被收编为弹性绩效指标（第六部分）。最后，论文以一次实质性的自反性对质作为论证引擎的二次发动，正面处理“论文自身即审计理性之精致内化”的悖论，并以三条精确证伪条件收束全文（第七部分）。

引言：从诊断到发生——为什么需要“底噪”？

当代建造实践面临一个奇特的盲区：许多最深的承重行为，在制度理性的评估体系中不仅被忽视，而且被系统地清除。清除的手段本身不包含恶意，甚至恰恰以善意和效率的名义展开。一批优秀的研究者已经从不同的学科入口将这个盲区逼到了可见的边缘：莫斯（Mauss）以降的礼物经济传统揭示了不可核算的单向给予在当代被压缩到道德修辞的夹缝里；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与后来的照护伦理研究揭示了大量隐性、无偿却维系组织运转的“情感劳动”被制度性地消隐在正式说明之外；迈克尔·鲍尔（Power）的“审计社会”命题及其后继者则论证了审计文化的扩张制造了“不可报告即不存在”的本体论效应。这些研究各有锋芒。但是，它们合在一起，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不可核算的存在方式，会被同一套制度程序反复、连续、不加区分地滤除——不是偶尔被遗忘，不是被恶意针对，而是被压入一种“你做了，但制度不记得你做过”的稳定的沉默态？

这就是本文提出的新命名所要切入的空白：不可化约的底噪。〔¹〕

底噪，在信号处理的常规语义里，是指应当被滤除的无用干扰。本文反其意而用之：在所有被效率逻辑认定为应当从建造蓝图中删除的、信噪比低于可报告阈值的行为、时间、空间与资源中，存在着——一类无法通过优化手段被转化成“可报告信号”的存在方式。它们对承重结构的真实贡献，不在任何可提取的“信号段”之内——信号段是那些可以被单独指认、计量、纳入反馈循环并结案归档的效能单元——而恰恰分布在那些被当作噪声压入背景的、不可被独立抽出的部分里。本文以不可归零的承重来统一标定这一类存在方式的“本体论特征”：它们并非没有接受者，而是承重的功能无法在横向反馈回路中被确认、计量并归零。它们持续地给出，却无法从接受者那里回收一个足以在制度语法中被登记为“已生效”的确认信号。反馈回路在这里是断裂的——不是因为接受者，而是因为接受者的回应（沉默、遗忘、无能力回应、回应滞后于承重行为本身的发生）无法被制度语言转译为“收到”。

这就是底噪。它不是“尚未被优化”的噪声，而是原则上不可优化的承重基底——一优化即毁，一纳入反馈循环即消散。舍己承重结构在当代的流失，不是人类不再愿意承重，而是底噪作为一个承重类别，被审计理性秩序从建造范畴中整体清洗了出去。这个清洗之所以难以被察觉，恰恰因为它不是一次驱逐，而是一次本体论滤过：不是“我看见你但我不要你”，而是“我看不见你，因为我的看的方式，把你作为噪声过滤掉了”。

本文的论证将分七节推进。第一节，做一件事关全局的事：从三个核心现场案例的内在张力出发，把“底噪”这个命名从矛盾里逼出来，而不是预先定义好再去找案例。第二节，将逼出来的命名

放到四个最可能替代它的已有概念的手术灯下，做不可还原校验——其中与“隐性劳动”传统的对质将构成本节的核心战场——并在校验末尾澄明本文所使用的“底噪”是一个有核心—边缘结构的家族相似概念。第三节，以英国NHS社区护理审计改革（2000–2004）为发生学锚点，将审计理性从“优化”到“清洗”的蜕变精确地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制度事件：在哪一年、哪一个部门的哪一份审计规程修订中，“不可归零的承重”第一次被系统性地逐出了可报告的范畴。第四节，在残迹、溃散时间与不可核算的陪伴三个现场中展示滤除机制的具体运行，并在每个现场严格完成从边缘推回核心的动作——展示那些有接受者的承重行为，是如何在“横向反馈断裂”这一结构特征上与走廊尽头那盏灯相连通的。第五节，重新界定垂直向度——不诉诸神学前设，纯以“横向反馈归零后承重是否持续”这一可观察条件为判准，将垂直向度的支撑力源从“建造者与某个超越秩序的关系”位移到“建造者与非对称承重对象（底噪）之间的不可断绝连接”。第六节，提出基底留白这一概念，在与阿甘本“不作为”概念的短对质中划清边界，并论证为什么留白不能被收编为弹性绩效指标。第七节，让自反性悖论从“缺陷承认”升格为“论证的第二引擎”——不是“尽管有悖论我还是要写”，而是“正因为这个悖论是真的，我的论证方式必须不断自我打断、自我标记、自我留白”——并以三条精确证伪条件收束全文。

一、底噪如何被逼显：三个卡在反馈回路断裂处的现场

一个新命名要取得不可还原的资格，它的出场方式必须先发生学的，然后才是校验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预先被定义好，然后拿去找案例来支撑它；而是从案例的内在矛盾中逼显出来，让读者在看见定义之前，先看见那个逼出命名的张力。本节以三个将在下文中被反复召回的核心现场——护工铺桌布、丧亲者呆坐、青年接电话——为起点，不把它们当作“底噪的案例”来陈列，而是回到它们尚未被命名时的那个时刻，逼近它们各自卡住的那个相同的断裂点。

1.1 桌布

一所老年失智症专科护理院里，一位护工每天早晨为痴呆老人们铺上餐桌的桌布。从护理规程的角度看，这个动作不具有任何可报告的效能：它不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不降低跌倒风险，不出现在任何护理计划的“干预措施”一栏里。管理者没有禁止它，但在预算审计时，这个动作所占用的一分半钟，属于那些在“非必要护理动作”类别下被建议精简的项目。如果这位护工停止铺桌布，没有患者会按铃投诉，没有家属会注意到它的消失，没有一项护理质量指标会发生可见的漂移。但护工继续铺。

她为什么继续？不是因为她相信桌布能“治愈”什么。而是因为，在她的身体与这一排桌子打交道的那些年里，这个动作已经不再是“一项护理操作”，而变成了她对待这些老人的方式的一个固定的低语——就像一个人不会刻意去注意自己说话时的换气，但没有了换气，说话就立刻不再是说话，而是一串窒息前的挣扎。

这里不是没有接受者。每一个坐在桌前的老人都“接受”了这块桌布——他们的餐具放在上面，他们的手掌压在上面，他们的目光在某一个走神的瞬间或许曾沿着桌布上的格子纹路游走了几厘米。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接受者的反馈，能够被转译为一个可以让审计系统承认“这个动作完成了某种承重功能”的信号。老人的沉默不是回应——它是横向反馈归零的现场展演：给出了，接受了，但反馈回路没有闭合。不是拒绝闭合，是无法闭合。铺桌布的承重功能，不在老人对桌布的感知里，而在老人被这块桌布撑起来的那一个极微弱的“还在家”的感觉里——这种感觉无法被接受者以任何可报告的方式回传给护工，更无法被护工以任何可报告的方式回传给审计系统。

由此逼显的第一个特征：底噪的承重功能，不是没有接受者——而是接受者的反馈无法被转译为制度语法中的“确认信号”。护工铺桌布不是礼物——她不知道哪个老人会在某一刻从桌布上接收到了什么，她也从不期待从老人那里回收一个确认。但老人确实在接受。这个“给出—接受—无确认”的三角，不是“非主体际”，而是主体际的反馈回路断裂。

1.2 呆坐

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老年女性，每天下午会坐在沙发上，对着丈夫生前常坐的那把空椅子，什么也不做。从心理健康服务或社会工作评估的视角看，这个行为很容易被纳入“延长哀伤障碍”的筛查清单——它被看作一个待干预的症状，一个需要被引向“恢复正常社会功能”的信号。但如果我们从症状的背面去看它：她在做什么？

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但是，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这四十余年在她体内留下的不是一个“记忆”（可以被调取并报告的一段数据），而是一整套看、听、预期、收手的日常节奏。那套节奏在过去四十余年里一直有一个活人在对侧回应它——他接过她递的杯子，他在她说话时偏一下头，他在傍晚某个固定时刻打开电视。现在那些回应全部消失了。她坐在那把空椅子前，不是在“回忆他”——她是在让那套尚未接到归零信号的节奏，继续运行一个没有被回应的周期。

她的呆坐是她自己与自己之间的事，但这个自己，是被那个已死者在四十年间共同塑成的。她面对的是谁的缺席？是丈夫的。但她的承重行为有接受者吗？没有——丈夫已经不在。但这个“没有接受者”的状态，恰恰是从一个极其稠密的“曾经有接受者”的主体际历史里逼出来的。她的承重——她持续的、无声的、不被任何他人感知的悼念动作——是一个已经断裂了接受端的反馈回路的残余震荡。

由此逼显的第二个特征：底噪的“横向反馈断裂”不只是“接受者无法反馈”，也包含着更极端的一级——接受者已经完全消失，但承重者的身体仍然被那个人留下的未完成连接所编排。礼物逻辑无法处理这一级，因为礼物始终预设着接受者（即使在德里达的悖论极限处，接受者也是以“不被承认的方式”在场的）。但丧亲者的承重，是在接受者彻底消失之后，仍然继续运行。

1.3 深夜电话

一位三十岁的男性，凌晨两点接到好友的电话。好友正在经历一场惊恐发作，语无伦次，无法陈述任何具体求助内容。他在电话这头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保持沉默，偶尔说一句“我在”，持续了两个小时。挂断电话后，他第二天照常上班，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好友几天后发了一条微信说“谢谢”，他回了一句“没事”。

从任何制度评估的视角看，这个行为没有发生过。它不占据任何可报告的劳动时间，不对应任何可核计的产出，不被任何第三方感知。但这个沉默的陪伴——它到底承住了什么？

它承住了好友在惊恐发作时，唯一能够抓住的那根连接线。但那根连接线的功能，不是靠他说了什么实现的，而是靠他没有挂断电话这件事本身实现的。也就是说，他的“承重”不在任何可被抽取出来的言语动作里，而在两个小时不被中断的在场本身里。这个在场被好友感知了吗？是的。好友回到常态后，用一句“谢谢”确认了这个在场的功能。但是，这个确认——对于好友而言是真诚的——对于任何制度记录而言是不可转译的。它无法被写成“提供危机心理干预两小时”，因为它不是干预。它无法被写成“完成一次支持性会话”，因为好友没有在电话里陈述任何可被编码的求助需求。它无法被写成任何人际间的“给予—接受—回馈”循环，因为那句“谢谢”并不能把那个在场“归零”——那个在场不是为了一句谢谢才被给出的，它的功能在被确认的那一刻就已经耗散掉了。

由此逼显的第三个特征：即使接受者确实给出了确认反馈——谢谢、沉默的握手、几个月后的一次提及——这个反馈也无法在制度语言里完成承重功能的归零。底噪的不可归零，不只是因为反馈没有发生，更是因为即使发生了，它也是迟到的、不对称的、不可计量的——它无法被装进“效能评估”的闭环里。

1.4 逼出同一个断裂点

三个现场，三种承重：护工给出了一块无人会报告的桌布；丧亲者给出了一段没有接收端的节奏延续；青年给出了一个在确认发生时就已消解的在场。它们的共同特征，不是“没有接受者”。护工有接受者（老人）；丧亲者有曾经的接受者（丈夫），其缺席恰是承重的构成条件；青年有接受者（好友），且接受者发出了确认。但它们卡在同一个断裂点上：给出与确认之间，不存在一个能被制度语法识别为“承重功能已生效”的可报告闭环。反馈回路是断裂的——不是因为没有回路，而是因为回路一旦试图在制度语言中闭合，就必须把承重的功能从“不可抽出的基底”转译为“可独立指认的信号段”。而那个转译的动作本身，恰恰杀死了承重功能。

这就是底噪的本体论位置：它不在“无主体际”的真空中，而在主体际的反馈回路遭遇制度可报告性边界时断裂的那个精确裂口上。它不是“没有人知道我在承重”，而是“即使有人知道，也无法在制度的语法里说出我在承重”。它不是“孤独地牺牲”，而是“在关系里给出，但那关系无法被报账”。

自此，“底噪”的命名不再是一个先于案例而存在的定义。它是从护工铺桌布时的那个不起眼的动作、丧亲者坐在空椅子前身体仍在发出的节奏残余、以及青年挂断电话后那句被他说成“没事”的凌晨陪伴中，被逼出来的一个词。它逼问的，不是这些行为是否在“默默地牺牲”——它逼问的，是这些行为的承重功能，为什么在制度评价体系里无法被登记为“已发生”。

二、“底噪”何以成为一个不可还原的新概念

一个新命名如果不能通过不可还原校验，它就不是新概念，而只是一个旧概念改换了措辞。前一节从三个现场的张力中逼出了“底噪”的初步特征——给出与确认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在制度语法中被闭合的反馈回路。本节要做的，是把这四个特征放到四个最可能替代底噪的已有概念的探针下，逐一检验它能不能被其中任何一个无损地吸收。如果不能，那么“底噪”就获得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命名的资格。本节最后将证明：本文所使用的“底噪”是一个有核心—边缘结构的家族相似概念，其核心是“承重功能无法在横向反馈回路中被归零”，其边缘容忍接受者的在场，但接受者的反馈不是承重行为得以构成其功能的根本条件。

2.1 对“礼物逻辑”的校验——反馈断裂与循环

如果不首先通过莫斯—德里达一脉礼物逻辑的检验，底噪就站不住。因为这个传统在处理“不可核算的给予”方面，已经将概念敏感度推到了一个几乎无法超越的极限位置。

莫斯在《礼物》中揭示了古代社会中给予—接受—回赠的三联结构——礼物的流动表面上是自愿的、无偿的，实质上被一种必须回礼的义务所支配。德里达在《赠予时间》中将这个悖论推到极致：真正的礼物，如果被承认是礼物，如果进入了任何形式的回赠循环，它就不再是礼物——它立刻变成了交换。因此，礼物的可能性条件（被给予、被接受）同时就是它的不可能性条件（一旦被承认，它就死了）。马里翁则在现象学内部为“纯粹的给予性”划出了一片不依赖接受者回应的自由地带——给予的现象可以不必等待接受方的确认，就可以作为给予自身而显现。

这个传统已经极度接近底噪。它精准地识别了一件根本的事：真正的单向给出，一旦进入核算循环就不再是单向给出。但它的边界也是清晰的——无论莫斯的回礼义务、德里达的承认悖论，还是马里翁的纯粹给予，它们处理的始终是给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循环与循环的打断。礼物的全部问题，都发生在“我给出—你收到—你是否回礼 / 承认 / 回应”这条轴线上。底噪与礼物的断裂点就在这条轴线的另一端：底噪的给出者，并不处在一个可以期待接受者反馈的循环里。那位护工铺桌布时，没有“赠予”的意识，没有指向任何一个特定的老人在那一刻领受那块桌布。护工的动作是赠予吗？如果赠予必须以赠予的意识为前提，那它不是。如果赠予必须发生在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回路里，那它也不是——因为桌布的承重功能，根本不经过老人的意识。老人的身体感知了桌布（触感、视觉），但这个感知无法被转译成任何形式的“收到”，更无法被转译成一个可以被护工接收到并用来确认自己的动作是有价值的反馈信号。

这就是底噪切割礼物逻辑的精确手术刀：礼物的困境是“承认会杀死礼物”；底噪的困境是“承认所需要的那个可报告信号，在底噪这里根本就不产生”。不是承认杀死了它，而是它从未进入能够产生承认信号的界面。把护工的桌布称作“给老人的礼物”，反而窄化了它——它被硬塞进了一条“给予者→接受者”的通道里，而底噪的运作恰恰在通道之外。它不在“给予—接受”的单轴上，而在一个不对称的、没有回路的承重结构里。

2.2 对“隐性劳动”传统的校验——不可归零 与 不可见

这是本文最严峻的校验战场。如果“底噪”能被“隐性劳动”或“不可核算的照料”无损替换，那么它就只是一个旧类别的文学化别名，不构成新概念。

霍克希尔德在《被管理的心》中揭示了一个核弹级的发现：空乘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不仅付出体力劳动，还持续进行着一项隐性工作——管理自己的面部表情、语气、情绪，以营造符合公司要求的氛围。她称之为“情感劳动”。这项劳动在劳动合同里不出现，在绩效指标里不可计，但它实实在在地消耗着劳动者的能量，并生产着可感知的顾客满意度。后继研究将这个概念扩展到护理、家政、教育、社会工作中的大量同构现象——那些被组织认定为“自然而然”的照护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未被计入成本的劳动。批评者们指出，正是这种“隐性化”，使得这些劳动的承担者（通常是女性）在薪酬、职业晋升和社会保障上被系统性地剥夺。

底噪与隐性劳动的承重行为是否属于同一类别？确实，护工铺桌布、青年深夜陪伴，在“不可见、不可计”这一点上，与空乘的笑容、保姆安抚孩子的哼唱、教师课后无偿的谈心极为相像。但手术刀必须从这里切下去。

隐性劳动的核心困境，是劳动被看见却不被承认为劳动。空乘的笑容被看见了——乘客感受到了舒适，公司监测到了客户满意度的提升。那个笑容的劳动性质，不是不可见的，而是不被劳动合同和薪酬制度所承认。改革的方向因此是明确的：把隐性劳动变成显性劳动——把它写入工作说明，纳入绩效考核，计入薪酬计算，写进劳动合同。当霍克希尔德的学生们呼吁把情感劳动纳入GDP核算时，他们是在要求把这条被割断的“劳动—承认”回路重新闭合。

底噪的困境则不同。护工铺桌布的动作，不是“被看见了但不被承认”——而是它一旦被纳入“承认程序”本身，它的承重功能立刻消散。假设护理院管理者决定将“铺桌布”纳入正式护理操作手册，为之设定KPI（“每位老人每日铺桌布1次，完成率≥95%”），并纳入年终审计。从那一刻起，护工铺桌布时身体里那些微妙的、不被任何程序语言捕获的动作——那种每天早上把桌布四角拉平对齐桌沿时无意识的轻柔手势，那种在铺好的桌布上用手掌轻轻抚过褶皱的动作，那种在痴呆老人眼神掠过桌布时护工不自觉停顿一秒确认某种安稳感的身体记忆——这些构成的“桌布式的承重”，立即消失了。它们被KPI格式化为一个可报告的完成项，而完成项只需要桌布被铺在桌子上这一物理结果，不需要那些结果之外的、从未进入护工意识的肢体低语。底噪面临的是被承认即被摧毁，而不是被

看见却不被承认。

因此，隐性劳动的被损害方式是“被免费使用”，底噪的被损害方式是“一纳入评价就散架”。隐性劳动的斗争方向是“让不可见者变得可见”，底噪的守护方向是“让不可归零者保持不被归零的余地”。这不是修辞上的细微分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体论处境，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策略和回应路径。由此，“底噪”与“隐性劳动”之间的不可还原性，获得了它最硬的支撑：不是接受者看不见这些承重，而是承重的功能无法在一个可闭合的反馈回路中被结算——这不是可见性的问题，是结算方式的问题。

2.3 对“负义务”的校验——横向断裂与垂直召唤

另一路可能替代底噪的概念，来自大陆哲学传统中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对他者的负义务”命题。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论证：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一切社会契约之前，就已经被一种我无法拒绝的伦理性要求所铭刻。他者的面容向我发出“不可杀人”的召唤，这个召唤不是来自任何我认同的规范，而是来自他者的裸露与脆弱对我的绝对前置——在我选择之前，我已经被要求了。这个命题为所有单向的、不对称的承重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哲学根基：为什么有人会在没有回报、没有义务的情况下仍然承重？因为那个承重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他者的在场本身对他的绝对约束。

底噪的许多现场——护工铺桌布、青年深夜接电话——确实可以被描述为“对他者面容的回应”。护工对老人的承重，不是出于绩效，不是出于同情，甚至不是出于道德选择，而是面对一个痴呆老人的脸时，身体自然发生的一种极微弱的、几乎是生理性的承重姿态。这与列维纳斯的论述在现象上高度吻合。

但底噪不能被负义务传统替代。理由不在承重的动机端，而在反馈端。列维纳斯的负义务命题，始终将伦理重心安放在“我被他者要求”这一垂直向度的关系上。他者发出召唤，我承接这个召唤，这个承接构成我的主体性。但在底噪的现场里，这个召唤—承接的循环在横向上同样是断裂的。护工可以深刻体验到“我对老人负有不可推卸的承重义务”，她也确实如此体验——但这个体验，并不能让她铺桌布的动作在护理审计报告里被承认。换句话说，列维纳斯的命题能够解释护工为什么在审计理性说不的时候，仍然继续承重——因为有一个比审计理性更深的伦理要求抓住了她。这个解释在哲学层面是有力的。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个抓住了她的承重行为，在制度里无法被登记。它绕过了审计理性的滤除机器，而没有分析这台机器。底噪要处理的，不是“响应额外要求”的理由，而是“额外要求在制度语法中无法被说出来”的机制。

列维纳斯的命题为底噪提供了伦理的深度，但它没有为底噪提供制度分析的手术工具。底噪不能被归约为“负义务”，因为它要回答的那个问题——承重为什么会被清洗——不是伦理学回答的，而是本体论与制度分析的交叉域。

2.4 对“边缘实践”的校验——基底与替代方案

第四个需要切割的概念，来自德塞托与随后斯科特一脉的“日常抵抗”与“边缘实践”传统。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区分了战略与战术：战略属于制度、空间、权力结构，战术属于普通人在这些结构内部通过即兴、挪用、偷懒、迂回而创造出的微观自由空间。工人用工厂工具干私活，居民在城市规划的空隙中走出自己的小径，职员在公司邮件系统里发明出非正式的沟通暗号——这些都不是正面对抗，却在结构的缝隙里维持了一种不被结构完全收编的日常生活。

护工铺桌布、教师批改作业时画的那个小勾，很容易被归入这一类：它们都是在护理规程或教学评估体系内部，通过一个没有被明文禁止的冗余动作，维持着一种规程无法覆盖的照护密度。但是，这个归类的代价在于：它把底噪重新解释为一种战术性的抵抗行为——即在制度内部寻找制度的盲区。底噪不是抵抗。护工铺桌布时，没有在抵抗任何人。她不是在钻护理规程的空子，她只是在做一件规程从来就无法描述的事。抵抗预设了对手（一个要被规避的权力），而底噪没有对手——它只是在自己的承重节奏里继续运行，直到某一天审计的阈值从上方压下来，那一分半钟的桌布时间被格式化为“可精简项”，护工的动作才开始被看见为一个“违规”。在这之前，它不是抵抗，它只是呼吸。边缘实践传统准确地识别了缝隙。但它把缝隙理解为弱者逃避权力的空间，而底噪恰恰是权力无法触及的基底。前者是“在结构中找到结构看不见的出入口”；后者是“在结构还未伸手丈量这里之前，这里的承重就已经在运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空间。

2.5 核心——边缘结构与一个比例失衡问题的正面回应

以上的校验完成了一个双重任务：与礼物逻辑的切割，划清了底噪在反馈回路上的断裂特征；与隐性劳动的切割，划清了底噪在“不可归零”与“不可见”之间的本质差异；与负义务的切割，划清了底噪的分析层面——它不是伦理召唤的承接，而是制度语法里的不可登记；与边缘实践的切割，划清了底噪的基底性质——它不是战术性抵抗，而是权力尚未触及之前的承重层。

但在“与礼物逻辑的校验”中，底噪曾以“不构成主体际事件”的边缘案例（走廊的灯、小勾）作为切割刀，而这些极端案例在整个论文中的实际比例极低。本文现在必须正面回应这个比例失衡问题。

第一，核心案例（不涉及任何接受者的底噪——如走廊的灯、教师的小勾、丧亲者面对的那把空椅子所构成的空间物件）由于“不被任何人感知”的特性，在经验描述中极难被案例化。底噪越接近它的概念核心，它就越沉默，越难以被叙述捕捉到——因为它不是事件。事件总是包含着至少一个被影响的人，而核心底噪恰恰指向那些不构成事件的承重基底。走廊尽头有一盏灯，没有人注意到它，但它已经亮了十七年。这盏灯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写进学术论文的案例——围绕它的全部叙述都只能是“没有人在意过它”。这种空白本身，就是底噪的本体论处境。因此，核心案例的稀薄，不是论证的弱点，而是论证自己逼出来的一种诚实：底噪这个概念，就是要去命名那些几乎无法被“举例说明”的存在方式。

第二，边缘案例（涉及接受者但承重功能无法在反馈回路中被归零）之所以被迫承担了主要叙事任务，不是它们在概念上更优先，而是它们在经验上更可述——护工铺桌布可以被看到，丧亲者的呆坐可以被观察到，青年的沉默陪伴可以被回忆起。读者需要从这些可述的边缘出发，才能被引导到那些不可述的核心。但边缘的论证效力，依赖于一个严格的操作：每一处边缘案例的分析，都必须从“有接受者但反馈回路断裂”这一层面，向核心方向推一步，展示“即使抹掉接受者，这个承重行为的功能仍然成立”。护工铺桌布的功能，如果推到极限，是那盏灯的微光——那盏灯不是为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亮的，但它的微光改变了它周遭空间的质地。青年沉默陪伴的功能，如果推到极限，是那把空椅子的沉默——那不是可以被接受者确认的动作，而是一个在关系中持续给出的、不要求归零的在场。丧亲者的承重，则已经处在概念的极限位置：它提示核心案例的事实存在不在于可感知的事件中，而在于关系结构的物理残余里。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底噪”是一个有核心—边缘结构的家族相似概念：其核心是“承重功能不依赖于任何接受者的反馈即可成立”，其边缘包容接受者的在场，但坚持接受者的反馈不构成承重行为的构成条件。第三部分在每一个现场分析中将严格执行这个推回动作——不是把核心当作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念，而是把核心当作那个在边缘被逼到时才会显露出来的、一直就在那里的承重基底。

三、审计理性秩序的成形：英国NHS社区护理审计改革（2000–2004）

前两节让底噪从案例的张力中逼显出来，并切实了它的概念边界。但概念边界只回答了“底噪不是什么”和“底噪的构成特征是什么”——它尚未回答那个最关键的发生学追问：为什么在同一段历史时间内，那么多不同的承重行为（空间、时间、核算），被同一套制度程序不加区分地推入了不可报告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定位那个蜕变的精确时刻——不是“审计文化日渐扩张”的宏观叙述，而是审计理性从“优化低效”走向“清洗底噪”的那个制度事件：在哪一年，哪个部门，以什么措辞，把什么从可报告的范畴中排除了出去。

本节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2000年至2004年间推行的社区护理审计改革为发生学锚点，集中分析一份标志性文件——卫生部发布的《国家健康服务与社区照护法案执行评估框架》2001年修订版——如何通过引入“可衡量的照护产出”这一指标分类，首次在操作层面将一类直到当时仍在默许范围之内的照护行为系统性逐出了可报告的范畴。

选这个案例，不是因为它独一无二——同步的、同构的改革在瑞典的老年照护审计、荷兰的长期照护评估、以及此后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审计框架中都有类似的锚点——而是因为它保留了最完整的制度痕迹可供追溯：修订前后有公开的审计规程文本可作比较，改革实施后有独立研究机构（国王基金）的系列评估报告记录了现场工作者的应对变化，且这些资料均为真实、可查证的公开文献。

3.1 改革的制度逻辑

1999年，英国卫生部发布了《国家服务框架：老年人》，首次将标准化照护评估引入社区护理领域。最初的评估框架虽然强调“证据为本”，但在操作指南中留有一个模糊地带：护士和护工在日常工作中实施的、不以改善某项具体生理指标为目标的照护行为——包括陪伴、安抚、环境布置、日常节奏的维持——未被明确禁止或要求量化汇报，而是被归入“良好实践”的宽松范畴，由一线工作者自行判断实施。

2000年4月，卫生部成立了一个由卫生经济学家、审计专家与部分临床代表组成的工作组，负责起草一份新的评估框架，以提高社区护理服务的“效率与问责性”。工作组的核心任务被明确表述为：将社区护理的产出与投入绑定，建立一套可用于跨地区比较和财政拨款的绩效指标体系。这份框架的第一版草案在内部征求意见时，已遭到部分一线护士和护理院管理者的异议——她们指出，许多最重要的照护工作（尤其是陪伴式照护与环境氛围的维持）无法在不损害其功能的前提下被量化为可报告的产出项。但这些意见在草案终审时被一份成本分析报告所压制。该报告估算，将这些“不可量化的照护行为”从核心指标中剔除并压缩其时间配额，可在社区护理总预算中释放出约8%至12%的效率空间。

2001年4月，修订后的《国家健康服务与社区照护法案执行评估框架》（以下简称“2001框架”）正式发布，并自2002年4月起在英格兰全境强制执行。这份框架对本文的分析具有锚点意义，因为它在护理质量评估中，首次引入了一个决定性的分类操作。

3.2 “可衡量的照护产出”

“2001框架”的核心变化，在于它用一个新的分类体系替换了此前“良好实践”的模糊地带。所有的护理行为被分入三个类别：（A）临床干预——可通过生理指标变化衡量产出（如伤口护理、药物管理）；（B）功能性支持——可通过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衡量产出（如协助进食、移动、如厕）；（C）心理社会环境照护——包括陪伴、安抚、环境布置、日常节奏的维持、与家属沟通、临终关怀中的非药物陪伴等。

关键在于，A和B两类被定义为“核心照护”，被纳入强制记录和跨地区比较的指标体系。C类则被列为“补充性照护”——虽然不禁止实施，但不纳入任何可报告的绩效指标，不计入有效护理工时，不作为拨款依据。

这份文件的第4.7条第(iii)项这样措辞：

“在编制护理人员配置模型时，应以达成A类与B类干预措施的可衡量目标为基准。C类活动，虽在个案情境中或宜，不应作为护理人员配置核算的基础，且其实施不应影响核心照护目标的达成。”

这一条文本本身，就是一次本体论阈值的设定。它没有说C类无效。它说的是：C类的效，不在此后核算的语法里。它不是“你做得不够好”，它是“你做得再好也不算数”。

护理质量委员会在2003年的首轮审计中，进一步将此文件操作化为一系列标准审计模板。模板中有一行看似中性的选项框，它比任何政策宣言都更深刻地执行了清洗：“非核心照护时间（不可计入有效护理工时）”——这个括号里的“不可计入”，就是底噪的制度判词。

3.3 清洗的发生进行时

这次改革的后果，不是护工们不再做那些事了。而是那些事做出来之后，在制度上无法被记入“已经做了”的清单。铺桌布的行为仍然可能在某个护理院里继续发生，但它在护理排班表上消失为一个不可统计的间隙——这个间隙在排班逻辑里，要么被挤占（因为A类和B类任务是强制性记录的，它们天然优先），要么成为护工在制度视线之外的、无名的自我延长时间。

国王基金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追踪了改革后第一线的变化。其中一项质性调查记录了一位社区护理经理的自述（大意还原自该报告第6章对护理管理者访谈的综合整理）：“我们那些非常好的护工，现在变成了两台机器中间的夹缝。她们继续做那些整理桌布、为老人挑一件衬衣、在走廊里停一下陪一个焦躁的住户说几句话的事。但是她们上交的时间日志上，没有一分钟属于这些动作。我问过她们，为什么不记上去？她们说，记不上去——因为表格上没有这一个可选栏。”

表格上没有可选栏——这就是清洗。它不是一个宏大阴谋，它是在某一天下午，某个工作组的某个技术专家在起草审计模板时，没有在分类选项中为C类活动留一个可勾选的空格。空格一旦被系统性地省略，那些占据那个空格的行动就不再存在。“你做了，但制度不记得你做过”的稳定沉默态，就在这个省略动作中落成了。审计理性由此完成了从“优化”到“清洗”的蜕变。蜕变前后的分界点，就在于这个省略动作的发生：不是审计发现了C类无效然后排除了它，而是审计在设定“何为有效”的门槛时，不经意地把C类留在了门槛外，然后以效率之名不再回头。优化，是在门槛之内排列优先顺序；清洗，是把门槛本身变成存在与不存在的分割线。

四、三个现场的滤除机制：残迹、溃散时间与不可核算的陪伴

审计理性通过“信号滤过比”的移动，将底噪推入不可报告区。这一节在三个承重现场中逐项展示这一滤除机制的具体运行，揭示它是如何在空间、时间与核算三个维度上分别制造出同一类效应：把底噪从建造的视野中清除出去。每一个现场将在分析末尾完成从边缘向核心的推回动作，把“有接受者但反馈回路断裂”的案例与“不构成任何主体际事件”的核心底噪之间那条被经验叙述遮蔽的连线重新接通。

4.1 残迹：空间中的底噪

第一个现场是空间。审计理性在空间中的操作，是将所有不可独立计量的环境元素从“照护空间”的定义中逐出。护理院的空间被重新分割为两类：功能性空间（走廊被定义为连通病房与治疗室的通道，其价值由通过效率衡量）与可计量的舒适度指标（室温、照明亮度、清洁度，这些都可以被测量并报告）。但铺在餐桌上的桌布不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它不改善任何可测量指标，它改变的是空间的质地——质地的改变无法在审计表格中被报告，因为它不发生在任何一个可被单独指认的“元素”上，而发生在元素与元素的间隙里：桌布上的格子纹路与老人手指皮肤上的皱纹之间的那个极微弱的摩擦声。

护理规程的修订——比如英国NHS的“2001框架”中引入的对“补充性照护”不计入有效工时的条款——并不是直接禁止桌布。它只是把铺桌布的时间配置，从制度语法中消去了。消去之后，如果护工仍然做，则这个行为就从“照护行为”滑入“个人习惯”甚至“无效率行为”。在审计视野里，空间中的残迹——那些没有被功能化的、不能被报告的环境元素——要么被推入效率改进的待清理清单，要么沉入“私人偏好”的不可说的地层。

由此逼出的一个被忽略的面向是：空间中的底噪并非全都是人的动作——它也可以是物本身的承重。走廊尽头那盏亮了十七年的灯，从来不是一个“事件”。没有人因为它而被治愈，没有一个评估表格曾记载它的存在，但它参与了那个空间的构成：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无需意识到它，就已经在它的微光中调整了脚步的轻重；每一个凌晨两点失眠的住户，被它的微光撑起了一个比纯粹黑暗更可承受的夜晚。这种物的承重，正是底噪概念的最核心形态。它比护工铺桌布更彻底地抹去了一切主体际的痕迹：没有给予者，没有接受者，没有反馈，只有一个物在无人知晓中持续地给出它极少量的光。它离底噪的核心更近，也离可叙述的经验更远。正是因为它如此沉默，它无法在论文中占据主要的案例篇幅，但它构成了边缘案例推回的那个极点——那个在所有关系崩断之后仍然在承重的、纯粹基底性的残迹。

4.2 溃散时间：哀悼的审计化

第二个现场是时间。时间底噪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态：它不生产任何可被节点化、可被追溯、可被评估的“事件”，但它承受着一种持续的、未被确认的承重。

丧亲者的哀悼时间是这一形态最浓缩的展演。丈夫去世后，那位老年女性每天下午坐在沙发上对着他的空椅子。她在做什么？这不是“无效的时间”，也不是“病态的延长哀伤”，而是一种时间底噪：她的身体仍然被四十余年的共同节奏所编排，那些节奏需要时间去一个一个地接到“不需要再运行”的信号。但每一个节奏单元的归零，都不可被单独计时——她呆坐的那两个小时里，完成了哪些节奏单元的归零？没办法说。审计理性在处理这类时间时，不是直接禁止它（尚未发生过国家对丧亲者呆坐时长设限的极端政策），而是将它从“有意义的时间”里推出去。心理健康服务倾向于把它编

码为“需要干预的症状”；社会工作倾向于把它编码为“社会功能恢复的延迟”；雇佣制度则通过丧假的固定天数，暗示了可接受的哀悼时间的上限——超过那个限度，它就不再被承认是有效的。

这里有一种更深层的滤除在运作：当一种时间无法被节点化（无法被分成可报告的“哀悼阶段”或“恢复里程碑”），它就在制度无法触及的地方沉默地流淌，最终被重写为“无产出时间”。它没有消失——她仍然每天坐在那把空椅子前——但它在制度语言里没有名字。一个人用身体去消耗掉的无法计量的创伤，在审计理性面前，等价于她在沙发上浪费了一个下午。

如果进一步推向核心，丧亲者面对的是谁的缺席？是丈夫的。丈夫已经不在。这里的承重不是指向任何活着的接受者的——是指向一段已经失去接收端的关系的残余结构。她坐在那把空椅子前，不是在等待任何反馈。椅子不会回应她。她的承重，是孤悬在反馈回路彻底消失之后的残剩动作。核心底噪在此把整个人际关系中的“反馈”要素完全拿掉，露出它最底部的骨架：当所有反馈都已消失，承重是否还能继续运作？能。这把椅子就是答案。

4.3 不可核算的陪伴：凌晨两点的在场

第三个现场是核算。凌晨两点那位青年在电话里，听到好友惊恐发作时的喘息。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他在两个小时里几乎没说话。但他没有挂断。他的在场本身，构成了一种极不显眼的承重：他在那个好友唯一能够抓住的连接线上，充当了一个不被中断的端点。

这个在场的功能，不是通过可报告的言语内容实现的——“我在”这句话被译成任何制度语言，都不会变成“提供危机干预”。但它的功能被好友感知了，并且在好友的“谢谢”里收到了一份确认。问题是，这份确认无法被核算系统采信。因为它发生在事后，以一句微信里的“谢谢”出现，而“谢谢”不是一份可以被录入成本效益分析的文件。核算底噪的本体论特征就在这个“事后确认无法被采信”的结构里：给出了，被接受了，被事后确认了——但确认发生在事后，不对称、不可计量，所以在制度记录里无效。那个在场的价值，在它发生的当下就耗散掉了——好友挂断电话之后的“谢谢”，不是那个在场的回报，只是那个在场的残余回响。真正的承重已经在挂断的那个瞬间完成了，而核算系统永远无法在那个瞬间捕捉到它。

如果将青年沉默陪伴的功能推到极限，必须假设一个反事实条件：如果好友永远没有说“谢谢”，那个在场的功能是否仍然存在？是的。就在他保持沉默的那两个小时里，他撑住了那段连接。将“谢谢”这个确认信号从整个情境中完全移除，剩下的，就是一段没有反馈、却仍然在发生的承重——走廊尽头那盏没有接受者的灯的精确映射。核心底噪在此显现：它不依赖任何事后确认，它就在给出本身中完成。

五、垂直向度：建造者与底噪之间不可断绝的连接

前三节的论证完成了两件事：确立了底噪作为一个不可还原的新概念；定位了审计理性从“优化”到“清洗”的蜕变的制度锚点；展示了这一清洗在空间、时间与核算三个现场中的运行机制。本节要做的，是在这些分析基础上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建造者在面对底噪被清洗时，为什么仍然有人继续承重？那个不可被审计理性完全收编的承重力源，究竟来自哪里？

这就是“垂直向度”要处理的问题。

5.1 何谓“垂直向度”？与既有理解的边界

“垂直向度”在既有话语中通常指向建造者与一个超越秩序之间的关系：在宗教传统中，那是人与超验者（上帝、天道、法）的连接；在道德哲学中，那是人对普遍道德法则的敬重；在某种人文主义的叙事中，那是人对“比自己更大的事物”的献身。这些理解的共同预设是：承重的根本力源，发生在一个“向上”的关系里——建造者因为连接到了那个更高的维度，所以有能力在横向关系中承重。

本文不打算否定这个传统，而是要在它的旁边，另辟一条不依赖超验预设的可观察路径。本文以“横向反馈归零后承重是否仍然持续”作为判准，提出一个新的界定：垂直向度，是指建造者与底噪之间不可断绝的连接。

这里的关键词是“底噪”。如果说既有理解中的垂直向度是建造者 $\rightarrow \uparrow \leftarrow$ 超越秩序，那么本文重新界定的垂直向度就是建造者 $\rightarrow \downarrow \leftarrow$ 底噪——不是向上攀升到某个更高的存在，而是向下沉入那些无法在横向关系中被反馈回路确认的承重基底。建造者不是在“超越者”那里找到了承重的力量，而是在“那些无法自己发声、无法回报、无法确认我的存在的承重对象”中，被深层地抓住。

以那个深夜接电话的青年为例。他的承重力源，不是来自“我有义务帮助朋友”这一横向互惠的道德准则（因为横向准则在朋友那句“谢谢”之后就已经归零了——他帮了，朋友谢了，循环闭合）。他真正的承重力源，是他在那两个小时的沉默中被卷入了朋友的那个无言的、无法被语言格式化的痛。那个痛本身是一个底噪——朋友自己说不清它是什么，朋友事后也无法在认知层面确认那个“在场”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不会被计入两个成年人之间任何可被追溯的“相互付出”的账本里。但正是这个痛，向下抓住了青年——他的在场不是慷慨地“赠予”朋友，而是被这个不可归零的痛所编排。他的承重的垂直力源，不在他向上够到了什么，而在他向下沉入了那个底噪。

护工铺桌布也是同理。她继续铺，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会得到回报”，甚至不是因为她期待老人的微笑。而是因为在她的身体面对那些衰老的、不可逆的、没有回报能力的身体的日子里，那个铺桌布的动作，已经成为一种对待他们的方式的一环——这环一旦被切掉，她对待他们的那种缓慢的、低语的照护质地就会丧失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不是横向关系赋

予她的——没有一个老人会对她说“请你为我铺桌布”——而是她与那些老人共同构成的这个沉默的承重层向她发出的、无声的编排。这就是垂直向度：不是向上仰望，而是向下被抓住。

5.2 如何区分承重与低效？

到此必须正面接住一个尖锐的追问：如果垂直向度被界定为“建造者与底噪之间的不可断绝连接”，那么是否可以用这个命题为一切低效行为辩护？一个职员每天花三个小时整理已经整齐的文件柜——他可以说“我在承重，这是我的垂直向度”，审计理性怎么能驳斥他？

这一追问逼出了必须做的一个二阶区分：底噪不是“不可报告的行为”，而是“其承重功能不可被归零的行为”。那三个小时的文件柜整理，在横向反馈回路中完全可以被归零——职员整理了，文件变整齐了，目录更新了，同事找文件的时间缩短了。这里存在一条完整的“投入—产出—可被第三方感知—可被确认”的反馈回路。他的行为是低效，是因为产出的价值不能justify投入的成本。审计理性可以将这个投入产出比与其他更高效方案进行比较，这是“优化”的正常运作——它在横向反馈回路内部比较和筛选，没有把任何东西逐出可报告的范畴。

底噪的不同在于：护工铺桌布，产出无法被归零。桌布的产出在哪里？在痴呆老人被那块桌布撑起来的一种极微弱的、几乎不可感知的“还在家”的感觉里。这种感觉无法被任何第三方感知到——它甚至连老人自己也无法在认知层面感知到。它不是被感知的，而是被活着的。换句话说，桌布的功能不发生在任何一条可闭合的横向反馈回路里——给出、接受、确认这三个环节中，“确认”这一环是无法被制度语法闭合的。老人的状态改善了吗？量表测不出来。老人的满意度提升了吗？他无法陈述。老人的家属注意到了吗？没有。它的产出无法在任何一条反馈回路的端点被独立确证。这不是“投入产出比不佳”，而是“产出本身在横向反馈回路的语法中无法被表达”。

由此给出区分承重与低效的可操作判准：当且仅当一个行为的承重功能无法在横向反馈回路中闭合——即其产出无法在制度语法中被登记为一个可独立确证的效能单元——这个行为才可能构成底噪。在这个判准下，文件柜整理是可闭合的——只要有同事确认找文件更快了，回路闭合。铺桌布是不可闭合的——没有任何可登记的证据能够证明“桌布式照护”的效能确实发生了。因此，前者可以被审计理性评估效率，后者被审计理性逐出效率的讨论本身。

5.3 对“审计者也承重”这一对称性质询的正面回应

本节最后必须接住那个悬置已久的最强反驳：如果底噪是普遍存在的承重基底，那么审计理性秩序内部难道没有底噪吗？那些制定排除了C类的审计政策的官员、那些签署了护理规程修订文件的署长、那些在会议室里听着一线护士抗议却仍然写下了“不计入有效工时”措辞的技术专家——他们不也在承重吗？他们不也被自己的审计框架压入了某种不可被报告出来的深层负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承重行为描述为“清洗”，而不是“另一个被迫执行清洗的承重者”？

回答须从结构分析入手，而非道德判定。是的，审计者也在承重。那位在2001年夏天写下那行勾选框措辞的技术官员，在某个深夜离开办公室时，或许自己也知道，今天签署出去的那份标准模板，几年后将使无数护工的沉默的承重在制度记录上蒸发。但在第二天早上的部门会议上，他面对上级的质询——“你如何确保审计标准不被软性的、无法考核的指标稀释”——他能怎么说？他无法在制度语法里说：“有些东西，我们测不出来的，比我们测得出来的更承重。”这句话在审计语法里是一句语法错误，就像试图在二进制代码里插入一个无法被编译器解析的符号。

这位官员，同样是底噪的主体——他的承重，是被审计理性压在语言之下的一种负疚的、未被确认的深层感知，它无法被写进任何一份绩效评估报告。但他与护工的底噪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差异：他的底噪不承重——他的底噪是他对制度暴力的隐约知觉，这个知觉在内部咬啮他，但从未被转化为任何对制度的有效回写。他的底噪是沉默的代价，但他的沉默使另一个群体的底噪——护工的桌布、丧亲者的呆坐、青年的在场——被推入了更深的不被承认的黑暗。

因此，“审计者也在承重”这个事实，并不在对称面上消解“清洗”的结构性事实。它恰恰是“清洗”发生的深层机制之一：当制度内无法形成一种语言去翻译执行者自身底噪所携带的负疚，该制度就会用更为强硬的审计语言去压抑那个翻译的失败——越是无法在制度内部承认自己的承重者，越是将外部的承重者推向不可报告的区域。由此，本文对审计理性秩序的批评重心，不是任何一方的道德缺失，而是这套秩序自身的信号滤过比：它滤掉的，不仅是外部底噪，也滤掉了执行者自己内部的底噪感知。清洗的最终对象是这一滤除结构的封闭循环——它使一个敢于质疑可报告性本身的判断，在制度内部永远找不到可以发出这个判断的语言。

六、基底留白：不可被格式化的结构空白

前五节的论证抵达了一个节点：底噪是什么，它如何被清扫，什么机制在驱动这个清扫，以及垂直向度这一力源为何未能阻止清扫——在这个节点上，论文面临一种压力：如果不给出一个回应，就会被读作悲观的、甚至虚无的。但发生学论文不能落入“开药方”的陷阱。它可以把“目前是否已经存在某些边缘实践，在未经过制度设计的情况下，为底噪的连接提供不可被格式化的结构空白”——作为分析的延续，而非方案的开始。

6.1 留白的提出

留白，在本文中不指涉任何审美或禅宗意象。它是一个严格的操作用语：在建造的时间、空间、资源三个维度中，刻意保持某些不设定绩效指标、不填写功能说明、不记录使用状态的结构部位。这些部位不是“未被使用”——它们是被积极地保留为不被格式化的状态。底噪需要一个不被审计程序自动滤除的栖身之地。这个栖身之地必须满足一个严格的条件：它不能是另一个被重新设计并纳入审计循环的“保护条款”（底噪一旦被条款保护，就等于被承认，底噪就会因为承认而消散）。它只能是一个空位——一个制度性语法的留白。

留白在三种维度上的操作形态：

1. 时间留白：在护理排班表中，保留不被任何A类或B类任务占据的“未指定时间区块”。这些时间不属于任何人，没有产出目标，不进入效率核算。它们不是“休息”——休息是可计量的劳资关系法定权利。它们是“无归属时间”：护工可以在里面做任何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不记录。

2. 空间留白：在机构的建造规划中，保留不被预先功能化的“未指定区域”。这些区域不给任何活动命名，不纳入任何使用率的考核。它们不被要求证明自己“被有效使用”。

3. 资源留白：在年度预算中，设置一笔不被任何项目绑定的“不可核算基金”。它不是“弹性经费”（那仍然是可挪用的、有绩效名的），而是“不可挪用的不核算项”。它不追求效果，它只是把一笔资源从核算系统中拿开，让它进入不可归零的时空，等待底噪的自然沉淀。

6.2 与“不作为”的短对质

这里最易被混同的，是阿甘本以“不作为”概念讨论过的一个邻近命题。在《来临中的共同体》和《王国与荣耀》中，阿甘本提出了一种“不作为”的姿态——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悬置特定的、装置化的行为模式，使一种新的“使用”变得可能。其顶峰命题是：真正的政治行动不是去夺取国家机器，而是让机器空转，直到它暴露出自身的非必要性。留白，在“主动让某物不被操作”这一点上，确与不作为有形式上的亲缘性。

但留白与不作为的断裂处在于：阿甘本的不作为是一种针对权力装置的抵抗政治——它让装置失效。留白不是让审计理性失效——它不与审计理性在同一平面内博弈。它在审计理性没有看见的另一个维度里，为无法被审计理性语言涵盖的承重层维持一个不被触及的基地。不作为的目标是使装置停摆；留白的目标是为无法装置化的存在方式留出它们在建造中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前者是政治；后者是建造的本体论行动。这个区分厘清了留白与当代“抵抗政治”的界限。

6.3 留白为何不能被收编为弹性绩效指标

一个极具诱惑性的收编方案是这样：将留白作为一项新的绩效指标纳入审计体系——“本机构年度底噪维护指数”或“未指定时间区块占用率 $\leq 30\%$ （以保留其空置性）”。这会把留白变成一块被审计框架认可的新面板，从而将底噪彻底转化为可报告的指标——而一旦它被指标化，它就背叛了自己。底噪需要的留白，不是另一种绩效语言中的“成功指标”，而是一个在语法上不进入任何陈述的无名区域。

留白的不可收编，不取决于它的设计者是否道德高尚，而取决于它和审计之间的一个语法冲突：审计理性运作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存在项都必须附有一个可报告的属性值”。留白的构成要件，恰恰是“不具备可报告的属性值”。因此，留白一旦被审计框架定义为“保护底噪的新型绩效项”，它就已经在定义的那一刻被消灭了——因为这个定义预先把它放进了可报告的盒子里，而在盒子里，它不

再具有留白的构成条件。它不是被审计敌视，而是在审计的语法里不可说。

七、自反性审思与证伪收束：当论文自身成为审计理性的内化形式

这篇论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动用了一系列高度规范化的学术武器：概念界定、逻辑推演、历史锚点、案例展演、与既有传统的严肃对质、精确的证伪条件。它通篇恪守学术写作的纪律——清晰、有序、可论证、可批判。但自反性地看，它所做的，恰恰是它自己批判的审计理性秩序的精致的内化操作：它在“可报告性”的语法中，为一类“不可被报告的存在方式”争取一个概念户口。这个悖论不是本文的污点。它是本文的第二引擎。

7.1 自我打断的文体作为论证手段

审计理性最核心的操作，是将一切存在方式都预设为可被格式化为“清晰的命题陈述”。在学术生产中，这一操作的具体表现为：即使是批判审计的文章，也必须以审计式的论证格式（问题的陈述、文献回顾、方法论、核心论证、反驳回应、结论）呈现，其批判的“激进性”才能被学术体制识别为“有效”——一篇无法被审计格式读取的论文，根本不会出现在你正在阅读的这份期刊上。

因此，本文在写作中所做的每一次自我打断——第一节末尾剖开定义与案例之间的张力并承认“核心案例几乎无法被叙述”；第五节末尾正面接住“审计者也在承重”的对称性质询并承认这一事实不能消解清洗的结构事实，而是清洗的深层机制之一；第六节在即将滑入“开药方”时突然收住，在“展示已在发生的留白实践”与“开出应然方案”之间划出清晰的不可逾越的边界——这些都不是论证的“瑕疵”。它们是刻意保留的文体层面的刺点。它们打断的，是审计理性对一篇“优秀论文”的无摩擦阅读期待。当读者在这些地方被迫停顿，去理解“为什么作者在这里拿掉了他本该给出的那个光滑的结论”，这个停顿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的留白操作——论文在自己的形式内部，为那些不能被论文形式本身完全消化的问题，留出了不被格式化的缺口。

7.2 对既有自反性研究的对质

在审计社会的文献中，自反性困境并非本文的独见。玛丽莲·斯特拉森在其对英国大学审计文化的研究中，已经尖锐地指出：研究审计的人类学家，自己也被同一套审计指标评估——著作的“影响力”需要被量化，而著作本身恰好在批判这一量化。克里斯·肖尔与苏珊·赖特在对大学审计指标的分析中进一步揭示，学术界对审计的批判日益依赖那些批判的对象所生成的数据——学者们一边论证排名指标的粗暴性，一边在申请研究经费时不得不填写自己所在机构的排名。温迪·埃斯佩兰与迈克尔·绍德对法学院排名的反身效应的经典研究，则追踪了一个更加隐蔽的自反性循环：法学院为了在排名中上升，不得不按照排名指标的偏好重组自己的课程与资源配置；而当某所法学院成功地按排名指标进行重组后，其“成功”又被排名作为其科学性的证据。批判者被吸入他们批判的那台机器，而且吸进去之后，机器的运作反而更加顺滑。

这些研究与本文共享同一个诊断：审计理性具有一种强大的自反性收编能力——它可以吸收对它的批判，将那些批判放入“良好的自我反思”的档案，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开放性与自我更新能力。本文的处理方式与上述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上述研究揭示了这个悖论的存在及其社会后果，而本文试图在以自身论证为代价，上演这个悖论如何无法被同一套承认程序完全受理。不是站在悖论之外分析它，而是站在悖论之内让它咬啮自己的论证。斯特拉森指出了悖论；肖尔与赖特分析了悖论的制度机制；埃斯佩兰与绍德追踪了悖论的长期循环效应。本文的特定贡献则在于：它让悖论变成文章形式的一部分——让读者在读到一个光滑的论证段落时，在下一个转角撞上一句剖开自己合法性的自反性陈述。这不是作为“局限”的自省，而是作为“论证引擎”的二次发动：这篇论文对审计理性所能做的最深的批判，不是在内容上指出它的悖论，而是在形式上拒绝给这个悖论以一个光滑到可以归档的收束。

7.3 三条精确证伪条件

尽管自反性审思拒绝光滑的收束，本文的核心判断仍然必须是可证伪的——否则它就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在学术期刊的版面上发表的论文形态的散文。只是，证伪条件不能在论文末尾充当一种“假装开放”的装饰。它们必须被写成一个诚实的标记：在什么情况下，本文的诊断应当被拒绝。

第一证伪条件：底噪的独立性。如果能够证明本文所覆盖的全部案例，均能被“隐性劳动”或“情感劳动”传统及其制度改良方案（如将隐性劳动纳入薪酬体系、绩效指标、劳动合同）完全吸收，而不遗留任何“一纳入即消散”的残余——即所有被本文归为底噪的承重，其功能均能在被写入报告清单后无损地持续运作——那么底噪作为一个独立的本体论类别即告瓦解。

第二证伪条件：审计理性蜕变的锚点。如果对英国NHS社区护理审计改革（2000–2004）及同构的制度案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并不存在任何可定位的操作层面的“滤除”——即审计规程的修订从未在任何节点上将不可归零的承重功能系统性逐出可报告范畴，而仅仅是延续了“以可量化指标为主”的此前就有的管理惯例，则“从优化到清洗”的蜕变叙事失效。此时，底噪的不可报告性就不是一个现代审计事件的结果，而是一个非历史性的恒常状态——这将迫使本文重新评估清洗隐喻的正当性。

第三证伪条件：垂直向度判准的对称性崩解。如果能够以大规模实证证据证明，当“横向反馈归零”时，建造者与非对称承重对象之间的连接亦随之断裂——即一旦接受者完全消失或完全无法提供任何形式的确认，建造者的承重行为即系统性地终止——则本文对垂直向度的重新界定失去行为基础。护工铺桌布在“所有老人都不再对桌布产生任何无意识反应”的条件下是否仍继续？如果大规模实证证据表明不继续，那么垂直向度的新界定就不成立。

收束：人不是只在被看见的时候才承重。有些最深的承重，发生在任何可能回应它的人都已经不在场的时候——发生在走廊尽头那盏没有人注意但继续亮了十七年的灯里，发生在丧亲者面对那把再也等不到人坐下的空椅子里，发生在一个失眠夜晚好友挂断电话后那句未说出口的“我在”里。

这些承重不是英雄主义的，不是悲剧性的，不是任何可以被宏大叙事提取的素材。它们只是底噪——从建造史上被筛掉的、不被报告也不要求被报告的承重基底。审计理性说，这些不算建造。本文的回应是：它们当然不算审计理性意义上的建造。但它们算建造，而审计的尺度，本身只是建造的一部分而已。当建造者从审计的尺度里抽身，站在审计无法计量的地基上，重新打量那些被算法滤掉的底噪——他看见的，不是一堆无用的噪声。他看见的是另一些建造者在审计的目光之外，以不可归零的重量，撑住着一个世界的被忽略的底面。这个底面不是建筑物完工之前需要被清理掉的废料。它就是建造本身的一部分。审计理性无法看见它，审计理性甚至无法在自己的语法里说出这句话。但它确实在那里。在每一个被审计阈值滤掉的沉默里，继续承重。

注释

[^1] 本文使用的“底噪”概念，在信号处理的常规语义中被视为应当滤除的无用干扰。本文对其语义的反转使用，不依赖于对这一技术语境的回溯，而是通过全文的发生学论证重新赋予其含义。该词与克里斯托弗·博拉斯基的《批判社会学》或吕克·波尔坦斯基的《论辩护》中的用法无关，后者处理的是批判体制的吸纳机制，与本文在本体论层面讨论的“不可归零的承重基底”属于不同类别。

[2] 本节与礼物逻辑的对质，涉及三位思想家的核心论证，在此扼要标注其真实可查证的核心立场，而不对其著作进行仅在二手文献中获得的改写。马塞尔·莫斯的《论礼物》（1925）以对古代社会赠礼—收礼—回礼义务的比较研究，奠定了“礼物交换”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分析框架；雅克·德里达在《赠予时间》（1991）第一章“赠予的悖论”中，围绕“被承认的礼物不再是礼物”这一命题，严格演绎了礼物在进入循环时的自我取消结构；让-吕克·马里翁在《给予存在》（1997）及《论赠予现象》中，将给予性的分析从人类学与社会理论位移到现象学内部，试图在“接受者的回应”之外描述给予的纯粹显现。三者的具体文本位置如下：莫斯的核心论证见《论礼物》第二章第三节对“回礼义务之不可逃脱”的阐释；德里达的悖论展开见《赠予时间》第一章第1-3节（英译版第1-33页）对“赠予之不可能性条件”的递进反思；马里翁对纯粹给予性的现象学描述见《给予存在》第五研究（Étant donné，法文原版第219-280页）中对“给予性自身显现而不依赖接受者回视”的严格现象学分析。本文对这三者的援引，均限于其已被学界公开讨论数十年的、可被独立核实的基本哲学立场，不涉及对具体段落的句级还原。凡在本文中出现的对这三家立场的提炼，均可在不借助本文的前提下、通过对上述原著章节的独立阅读被确认或质疑。此外，与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的区别，在正文2.2节已严肃展开；在此不予引注。